经济增长与西部少数民族贫困
——基于甘肃省的实证研究

张 平, 祁永安
(西北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 甘肃 兰州 730124)

摘 要: 本文以甘肃 14 个少数民族国扶贫困县为研究对象, 重点考查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对贫困人口数量和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不应只强调市场机制下的宏观扶贫效应, 而应采用政府直接干预的方法, 通过特殊的扶贫措施, 才能实现真正扶贫。
关键词: 少数民族; 贫困地区; 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变动; 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9)04—0053—06

Economic Growth and Poverty of Minorities in West China: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Gansu Province

ZHANG Ping, QI Yong-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Lanzhou 730030, China)

Abstract: Taking 14 poor minority counties that receive relief from the state in Gansu Province as researching subjects, the paper focuses on impact of the chang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number of poor people and their incom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we should not only stress macro effect of poverty relief under market mechanism in helping poor people in minority area of west China, but also give more play to direc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dopting specific poverty alleviating measures and thus helping the poor.
Keywords: minority; poor area; economic growth;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empirical research

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 是经济、社会和文化落后状况的总称。贫困分为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是指其生活水平低于平均水平线以下, 生活水平较低; 绝对贫困是基本生活物质条件缺乏, 基本的吃饭、穿衣问题不能得到满足。我国扶贫对象主要针对绝对贫困群体。无论从国外还是国内来看, 学者们对于贫困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流派。

对贫困问题研究, 可以划分两个层面[1]: 一种是从微观层面研究个体(个人或者家庭)的基本需要, 来考察贫困发生的原因以及如何摆脱这种贫困状况的理论, 可称为微观层面的个体贫困理论, 如“贫困功能理论”、“个体缺陷贫困理论”以及阿玛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等; 另一种是从宏观层面, 研究一个国家整体贫困发生的原因以及如何打破贫困陷阱, 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理论, 可称

收稿日期: 2008—10—14
基金项目: 2007 年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甘肃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平(1977—), 四川仪陇人, 西北民族大学教师, 主要从事技术创新和少数民族经济研究。

为宏观层面的发展战略贫困理论，这一理论发展经历了结构主义贫困理论、新古典主义贫困理论和激进主义贫困理论。上述理论均界定了贫困的含义，剖析了贫困的成因，提出了反贫困政策，并在反贫困政策模式上形成了政府干预理论、自由市场理论以及多元治理理论等。

对于经济增长与贫困关系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能够使所有人都受益，因而能够绝对地减少贫困。如丹宁格（Deininger）等人[2]研究了1985～1995年间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增长与基尼系数的关系后，认为收入增长与不平等的变动没有明显关系。阿卢瓦里亚（Ahluwalia）[3]、迪莫瑞（Demery）①、罗蒙（Roeme）②的实证研究表明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都能有效地减少贫困。波哈拉（Bhalla）③和多拉（Dollar）[4]的研究也证明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但需要创建一定的环境。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增长对贫困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如果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不能使所有人都平等受益时，部分群体的贫困化会进一步加剧。这类观点源于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即“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5]。阿德尔曼（Adelman）[6]认为，在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不能自动减少最贫困人口，反而会使贫困状态趋于恶化。弗瑞尔（Ferreira）[7]认为：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

在国内，魏众[8]、陈少华④分别研究了中国1988～1995年、1990～1999年的经济增长与减贫的关系后认为，经济增长促进了减贫，但带来了收入差距扩大，二者的效果是相互抵消的。胡鞍钢[9]研究了1978～2004年的经济增长后认为，1980年中期后的减贫放缓源于经济增长质量下降和贫困差异的扩大，而万广华等人[10]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此外，张全红、张建华[11]的研究提出中国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由于收入水平和不平等的初始值不同，将使经济增长的减贫能力表现出较大差异，出现波动性和复杂性特征。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增长与减贫效应，也由于文化、地理背景的差异出现较大的差异。

可以说，经济增长与减贫效应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民族、文化、地理、历史原因等方面的深刻影响，因此，针对不同的减贫态势，就需要有针对性的治贫措施。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阶段落后于全国总体水平，市场化程度低，加之地域文化阻壑，存在经济增长与减贫效应不对称的现象。本文选择了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的14个国扶贫困县，利用总量分析方法，研究了区域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对贫困人口数量和收入的影响，实证在西部民族地区实施针对性反贫困政策的必要性。

二、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分析

甘肃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多民族省份，是中华民族伟大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全省有45个民族，世居甘肃的有回、藏、东乡、土、满、裕固、保安、蒙古、撒拉、哈萨克10个少数民族，其中裕固、保安、东乡是甘肃的独有民族，2006年全省少数民族人口为230万，占全省总人口的9.4%。甘肃民族地区包括甘南、临夏自治州的16个县（市）及张家川、天祝、肃南、肃北和阿克塞5个自治县，共21个县（市），是甘肃省藏、回、裕固等几个少数民族分别聚居的主要区域，民族自治地方土地面积17.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39.8%。在地理分布上集中于相对高寒阴湿的地区，处在青藏高原、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和戈壁草场地带，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由于地理环境、历史发展和社会经济等因素影响，经济发展以农牧业为主体。

甘肃少数民族地区中有14个国扶贫困县⑤。根据《2007年甘肃农村年鉴》和甘肃扶

① Demery, L. and Squire, L.. Poverty in Africa: an Emerging Picture. Washton D. C.: World Bank mimeo, 1995.
② Romer, M. and Gugerty, M.. Does Economic Growth Reduce Poverty?. CAERII Discussion Paper, 1997, (5).
③ Bhalla, Surjit. Imagine There is No Country: Globaliz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Poverty. Washton D. C.: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
④ 陈少华，王燕.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减贫：1990~1999年趋势. 世界银行政策研究论文，2001，(7).
⑤ 甘肃共有43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其中14个为少数民族自治县，分别为：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临潭县、舟曲县、卓尼县、夏河县、合作市，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临夏县、和政县、积石山县、广河县、康乐县、东乡县、永靖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天祝藏族自治县。

贫办统计数据：该地区总人口 274.74 万，劳动力人口 138 万，低收入人口 57.9 万（其中绝对贫困人口 29.29 万），农民人均纯收入 1800 元，耕地面积 18.82 万公顷（其中梯田面积 17.19 万公顷，有效灌溉面积 6.65 万公顷，经济作物播种面积 5.75 万公顷）。其基本特点是：贫困人口基数大，生产活动主要以农牧兼营或纯牧业为主，农牧民收入来源有限。

1. 贫困人口的改进森指数测算

关于贫困状况的衡量方法，常用的衡量指标主要有：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率、基尼系数测算法。其中贫困发生率能衡量贫困人口的规模，但不能衡量贫困线以下人口收入的变化；贫困缺口率能衡量平均贫困程度和相对贫困程度，但不能反映贫困人口的规模，无法反映贫困人口中贫困差额的分布情况，也不考虑贫困人口在贫困区域所发生的收入转移形成的影响；基尼系数法用洛仑兹曲线和基尼系数分解说明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但不能反映贫困人口收入减少和收入转移情况。鉴于以上三种指数均不能综合地反映贫困程度，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76 年提出了有关贫困度量的公理化方法，而且明确提出了一个贫困指数——森指数（以下简称 S 指数），弥补了贫困发生率和贫困缺口率测量贫困的不足。斯洛克斯（Shorrocks）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 S 指数（简称 SST 指数）。S 指数的测算原理为：

假设一个社会中有 n 个人，用 S 表示社会中所有人构成的集合，其中第 i 个人的收入为 y_i，贫困线为 z，收入水平不高于 z 的人为穷人，穷人所构成的集合为 $T \subseteq S$。假设 T 中有 q 个穷人，他们的收入从高到低排列，T 中第 i 个人的序列号为 $r(i)$，意味着他是穷人中第 i 个。

T 中第 i 个人的收入缺口为 g_i，那么

$$g_i = z - y_i \tag{1}$$

两个标准度量贫困人口比率度量（H）和收入缺口比率度量（I）分别为：

$$H = q/n \tag{2}$$

$$g = \sum_{i=1}^{q} g_i \quad i = 1, 2, q \tag{3}$$

$$I = \sum_{i=1}^{q} g_i / qz \tag{4}$$

森指数则为（P_s）：

$$P_s = H[I_p + (1 - I_p)G(g_p)] \tag{5}$$

即 P_s（S 指数）是贫困率、平均贫困差距率（I_p）和穷人贫困差距率 [G（g_p）] 的基尼系数加 1 的乘积。斯洛克斯提出的改进 S 指数与 S 指数有如下关系：

$$P_{sst} = HP_s + 2H(1 - H)g_p' = Hg_p'(1 + G) \tag{6}$$

SST 指数为度量贫困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工具，是对以往贫困指数的完善。S 指数与 SST 指数的差异在于 S 指数是穷人贫困差距率的基尼系数，而 SST 指数是总人口贫困差距率的基尼系数 G（g′）。SST 指数可以看成是 3 个指数的乘积：贫困发生率、贫困差距率、总人口贫困差距率的基尼系数加 1，即 SST 指数＝贫困发生率×贫困差距×（1＋总人口贫困差距率的基尼系数），分别表示贫困的范围、贫困深度和贫困的分布状况。在其他任意两个指标不变的情况下，每一个指标值的提高都表明社会福利水平的降低。

利用上述测算方法，甘肃少数民族地区 2001～2006 年的 SST 指数值如表 1 所示。

表 1　甘肃民族地区贫困状况

年份	SST	绝对贫困发生率(%)	贫困发生率(%)	贫困差距率(%)	1＋基尼系数
2001	8.05	14.98	48.02	15.17	1.11
2002	7.33	14.14	44.26	14.91	1.11
2003	7.08	12.8	40.96	15.45	1.12
2004	6.15	11.57	36.47	15.2	1.11
2005	5.23	10.57	32.43	14.63	1.1
2006	4.73	9.9	29.86	14.29	1.11

数据来源：2002－2007《甘肃统计年鉴》，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甘肃省“十五”期间扶贫开发资料汇编》，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2006、2007 年相关统计数据。

2001～2006 年间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减贫工作成效明显，绝对贫困发生率与贫困发生率分别降低了 5.08 和 18.16 个百分点，SST 指数下降了 3.32。但是总体上该地区的贫困问题仍然十分严重，2006 年 SST 指数值为 4.73，贫困发生率接近 30%。测算结果反映出甘肃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特点为，贫困发生率高，但贫富差距尚不明显（基尼系数为 0.1 左右），贫困差距率较稳定且保持在 15%左右。

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绝对贫困人口减贫率与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关系见表 2，可以发现，总体上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绝对贫困人口呈下降趋势，但

自2005年以后，减贫率下降明显。从2002～2007年形成一个较为明显的减贫率变化波动周期。

表2 甘肃民族地区减贫率变化与绝对贫困人口数量

项目 年份	甘肃民族地区 减贫率（%）	甘肃民族地区绝对 贫困人口数（万人）
2000	—	46.75
2001	3.34	45.19
2002	4.87	42.99
2003	9.3	38.99
2004	9.0	35.5
2005	9.35	32.18
2006	6.0	30.25
2007	1.36	29.84
2008	2.17	29.19
2009	2.18	28.55
2010	2.26	27.9

资料来源：2001～2007年数据来源于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相关统计资料；2008～2010年数据为利用ARIMA（1，1，0）模型的预测结果。

2. 减贫率与宏、微观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通常情况下，减贫率高低受区域内宏、微观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为了简化研究，本文以全省GDP增长率代表地区宏观因素，以甘肃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代表微观因素来进一步考查减贫率变化的原因。回归模型如下：

$$\ln C = 1.911 + 0.072\ln GDP + 0.181\ln Y,\quad R^2 = 0.761$$

其中C代表贫困人口减贫率，GDP代表全省GDP增长率，Y代表人均纯收入。该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回归结果见表3所示。绝对贫困人口减贫率与全省GDP增长率、民族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存在线性关系，分别以二次和三次曲线进行拟合。相关矩阵（见表4）表明减贫率与GDP增长率、农民人均纯收入均有较强的正相关，符合一般性经验结论。而GDP增长率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有较弱的负相关且较为显著，说明甘肃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低于全省总体水平，即存在经济发展阶段上的滞后。

表3 回归结果

	回归系数	单变量的拟合方程
常数项	1.911 (0.142)	—
全省GDP增长率取对数（lnGDP）	0.072 (0.026)	$\ln C = 2.394 - 0.191\ln GDP + 0.094(\ln GDP)^2,\ R^2 = 0.603$
人均纯收入取对数（lnY）	0.181 (0.066)	$\ln C = 0.910 + 1.094\ln Y - 0.085(\ln Y)^3,\ R^2 = 0.503$

注：表中回归系数一列括号内为标准差。

表4 相关矩阵

	$\ln C$	lnGDP	$\ln Y$
贫困人口减贫率取对数（lnC）	1.000	—	—
全省GDP增长率取对数（lnGDP）	0.564 (0.094)	1.000	—
农民人均纯收入取对数（lnY）	0.557 (0.097)	−0.175 (0.354)	1.000

注：表中括号内为单尾时的显著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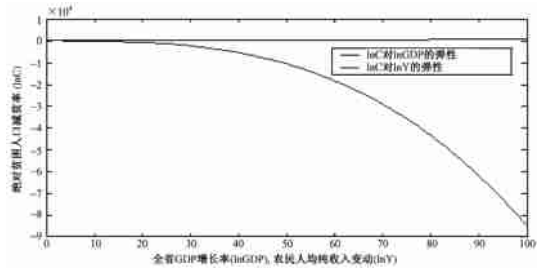

图1 减贫率与GDP增长率、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关系图

利用计算机模拟绝对贫困人口减贫率与全省GDP增长率、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动趋势，图1显示减贫率的GDP增长率弹性远小于减贫率的收入增长率弹性，即宏观经济因素对绝对人口减贫率的影响，远小于微观因素对绝对人口减贫率的影响。表明甘肃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低，由于缺乏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未能分享到总体经济增长带来的益处。

3. 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与产业结构变动关系的比较分析

通过对甘肃全省、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与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回归分析结果进行比较，可以进一步说明宏观经济政策对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情况。建立方程如下：

$$Y_{ij} = \alpha + \sum \beta_{ij} X_{ij} + \varepsilon$$

其中：

$$Y_{ij} = \ln \Delta y_{ij}$$

$$X_{ij} = \ln(s_{ij}\Delta x_{ij})$$

Δy为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

Δx为三次产业增长率；

S为三次产业比重；

$i=1$，2分别代表甘肃全省和甘肃少数民族地区；

$j=1$，2，3分别代表第一、二、三产业。

模型结果为：

$$Y_{11} = 1.124 + 0.166X_{11} + 0.681X_{12} - 0.348X_{13},\ R^2 = 0.959$$

$$Y_{21} = 0.853 + 1.842X_{21} - 0.214X_{22} - 0.039X_{23},\ R^2 = 0.989$$

回归模型主要参数值表明（见表 5），甘肃全省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主要受第二产业增长率的影响（其回归系数为 0.681，弹性系数为 0.859，R^2 值为 0.879），而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主要受第一产业增长率的影响（其回归系数为 1.842，弹性系数为 1.517，R^2 值为 0.945）。即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滞后于全省总体经济的发展。

各变量的相关矩阵（见表 6）反映各产业间关系的详细信息。甘肃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与第二产业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最大，为 0.938，且较为显著；其次是与第一产业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 0.895；与第三产业增长率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375。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与第一产业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最大，为 0.972；其次与第二产业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 0.516；与第三产业增长率有较弱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66。此外，无论甘肃全省还是少数民族地区，第一、二产业发展都呈正相关关系，而第三产业与第一、二产业间的发展呈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总体上甘肃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是第一、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较弱。

表 5　回归模型主要参数

甘肃全省			甘肃少数民族地区		
	回归系数	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Y_{11}）的弹性		回归系数	对民族地区农民纯收入（Y_{21}）的弹性
常数项	1.124 （0.403）	— —	常数项	0.853 （0.118）	—
全省第一产业（X_{11}）	0.166 （0.199）	0.753 （0.802）*	民族地区第一产业（X_{21}）	1.842 （0.166）	1.517 （0.945）*
全省第二产业（X_{12}）	0.681 （0.207）	0.859 （0.879）*	民族地区第二产业（X_{22}）	－0.214 （0.077）	0.343 （0.266）*
全省第三产业（X_{13}）	－0.348 （0.196）	－5.578 （0.141）*	民族地区第三产业（X_{23}）	－0.039 （0.033）	－0.025 （0.004）*

注：表中回归系数一列括号内为标准差，弹性一列括号加 * 内为 R^2 值。

表 6　相关矩阵

甘肃全省					甘肃少数民族地区				
	Y_{11}	X_{11}	X_{12}	X_{13}		Y_{21}	X_{21}	X_{22}	X_{23}
Y_{11}	1.000	—	—	—	Y_{21}	1.000	—	—	—
X_{11}	0.895 （0.003）	1.000	—	—	X_{21}	0.972 （0.001）	1.000	—	—
X_{12}	0.938 （0.001）	0.845 （0.008）	1.000	—	X_{22}	0.516 （0.147）	0.673 （0.071）	1.000	—
X_{13}	－0.375 （0.203）	－0.307 （0.252）	－0.119 （0.399）	1.000	X_{23}	－0.066 （0.451）	－0.079 （0.441）	－0.409 （0.210）	1.000

注：表中括号内为单尾时的显著性。

三、结论

从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分析中反映出几个特点：第一，贫困人口的基数大，但收入差距小，且收入分布较集中。第二，贫困人口的数量变化受宏观因素（如全省 *GDP* 增长率）的影响小，而主要依赖于微观因素（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动。第三，贫困人口收入主要来源于第一产业，且影响非常显著。

以上的几个特点源于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形成的共性原因。据统计，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多居住在偏远山区，高寒区，干旱荒漠化（沙漠化和土地沙化）区，岩溶、紫色砂页、红色砂区，生态环境极其恶劣，缺土、缺水、生产生活极其艰难。大多数地方以“农本经济”或“粮食经济”为主，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村二、三产业比重低，传统产业、传统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缺乏竞争力，经济效益差，增收途径少、难度大。多数贫困地区资源贫乏，人口自然增长率居高不下，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人口的科技文化水平低，就业机会少，剩余劳动力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即自然资源约束型贫困、资金约束型贫困、知识约束型贫困是主要类型[12]。此外，由宗教、民族等原因形成的封闭意识尚未完全解放。较

为封闭的社会经济活动使贫困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明显且分布集中。区域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经济环境、市场环境等诸多不利因素严重制约着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李石新等人[13]认为，库兹涅茨“倒U”假说的成立需要满足三个隐含的基本前提条件：其一，经济是否具有较高的自由度；其二，政府是否有效地干预经济；第三，经济增长是否仍处于一个长波周期之内。即只有在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或地区，政府适时实施有效宏观干预政策，在较长经济调整时间的基础上，该假说才能成立。否则，对于任何不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情况都将会形成不同的理论观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显然不满足库兹涅茨“倒U”假说的三个隐含条件，所以不应当只强调市场机制下宏观扶贫效应，而是需要提出特殊的扶贫措施。

从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有组织的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农村贫困人口快速减少，成就有目共睹。但是，随着脱贫人口数量的逐年减少和扶贫投入的不断加大，扶贫成本也越来越高，尤其是近年还一度出现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总量不降反升的特殊现象，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反贫困成效受到质疑。回顾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反贫困历程，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就是将扶贫目标定位于区域性反贫困，并以县为反贫困的基本单位。在大面积“普贫”的背景下，以县为单位确实能够提高扶贫效率、减少扶贫成本，但随着我国农村扶贫向纵深发展，农村贫困人口逐渐呈现出“点”状分布的特点。目前全国各省市均制定了相应的经济发展战略（如甘肃省“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工业强省战略”），在实践中的确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但是区域内的总体经济发展和产业调整战略缺乏对于极度贫困地区的瞄准性。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市场化程度低，存在较明显的市场失灵特征，收入来源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区域内宏观经济政策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减贫成效不大。此外，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差别明显，宏观经济政策对于减贫工作的效果也必然存在较大差异。

新时期，我国的扶贫总体工作表现为五个特点[14]：经济市场化、贫困多样化、所有制多元化，生态环境建设优先化，扶贫工作法制化。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措施也应当以此为参照。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措施应当强调政府干预，合理认识民族文化、民族政策对于减贫工作的整体推动作用[15]，不仅只注重提高扶贫效率，更应注重改善西部少数民族贫困人口的物质条件和参与能力，进而培育贫困人口的自身脱贫能力，实现扶贫人口的持续、健康和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楚永生. 发展战略贫困理论的演进、比较及其战略意义[J]. 老区经济，2008，(1).

[2] Deininger，Klausa and Lyn Squire. New Ways of Looking at Old Issues：Inequality and Growth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8，(2).

[3] Ahluwalia，M.，Carter，N.，Chenery，H. Growth and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79，(6).

[4] Dollar，David and Aart Kraay. 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uth，2002，(4).

[5] Kuznets，Simon.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5，(1).

[6] Adelman，Irma and Cynthia T. Morris. Economia Growth and Social Equ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7] Ferreira，Francisco and Ricardo Paesde Barros. Climbing a Moving Mountain：Explaining thd Decline of Income Inequality in Brazil from 1976 to 1996 [J].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mimeo，1998.

[8] 魏众，B. 古斯塔夫森. 中国转型时期的贫困变动分析[J]. 经济研究，1998，(11).

[9] 胡鞍钢，胡琳琳，常志霄. 中国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1978～2004）[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10] 万广华，张茵. 收入增长与不平等对我国贫困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06，(6).

[11] 张全红，张建华. 中国的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与贫困的变动：1981～2001 [J]. 经济科学，2007，(4).

[12] 张保民. 资源流动与缓贫 [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

[13] 李石新，奉湘梅，郭丹. 经济增长的贫困变动效应：文献综述 [J]. 当代经济研究，2008，(2).

[14] 温友祥. 略论21世纪甘肃扶贫开发的战略转变 [J]. 开发研究，2002，(1).

[15] 王建兵. 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扶贫战略 [J]. 开发研究，2006，(6).

[责任编辑　童玉芬]